

世間再無喬布斯



雷媛媛 如是我見

最近一段時間，全世界都在為一個人的去世而難過，他就是蘋果之父喬布斯。我並不是一「果粉」，也幾乎沒接觸過「蘋果」，按說喬布斯的去世與我毫無關係。然而喬布斯是最近的「話題王」，打開電腦，與他有關的消息充斥螢幕。本來我只有習慣性地瀏覽新聞，一篇一篇地讀與喬布斯有關的文字，不知不覺間，我不可免俗地成了「果粉」。如果是說喬布斯的「傳奇」所打動，迷戀上這隻上帝不慎遺落在人間的「蘋果」。

喬布斯是富有遠見和創造力的天才，他用Mac、iPod顛覆了音樂，用iPhone顛覆了手機，用Mac OS、iPad顛覆了電腦，用皮克斯電影工作室奉獻的《海底總動員》、《飛屋環遊記》顛覆了電影。喬布斯讓人們的生活，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改變。作為天才，他讓芸芸眾生望塵莫及。

在電子領域登峰造極的天才，在生活中也是一個普通人。普通人可能遇到的挫折，喬布斯也會遇到。在喬布斯光芒四射的成功背後，也有過很多失敗。但是喬布斯在失敗中提高自己的反省能力，從失敗中學到經驗，把失敗當做走向成功的基石。

喬布斯不是生而為神的，他是行走人間修行者。這二十年中，喬布斯的容貌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後來消瘦、深邃、永遠黑衫藍褲的這個人，與以前那個挺着肚子、臉頰圓潤的人，簡直不是同一個人。他從迷茫、浪蕩的少年出發，經歷短暫的成功，卻被自己一手創立的公司踢出門外。十年的流放生涯，磨去了他的孤傲、偏執、自大，他變得內斂平和、懂得跟別人合作。經過了失敗和挫折，他內心的修為到達了別人無法企及的高度。有人說，這才是他最大的成功。

「蘋果」讓世界發生了改變，喬布斯的思想也讓人受益匪淺。「你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為別人而活！」「求知若飢，虛懷若愚！」「把每一天都當成生命中的最後一天，你就會輕鬆自在！」……記住喬布斯的這些感悟，在懷念喬布斯的時候，也讓自己的靈魂得到些淬煉和昇華。

朋友打來電話說：「喬布斯去世了，我真的有些難過……」朋友是賣山寨「蘋果」的，他說已有工廠製作出印有喬布斯頭像的手機外殼，在市場上很受歡迎。山寨產業也悄然用自己的方式，紀念這位偉大的創新家。

無論人們是如何不捨，上帝已經收回了他遺落在人間的蘋果。世間再無喬布斯！他的背影漸行漸遠，我們能做的，只是默默緬懷！

「力克」是誰

許定銘



醉書亭

力克的《馬票與美鈔》（香港求實出版社，一九五二）是本約八萬字的小書，一四六頁，收《自由職業》、《寒風裡的熱流》、《花街皇后》、《遺產》、《邂逅》、《剪刀女俠》、《呂正蒙過節》……等十三個短篇。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騙徒，有企街的妓女，有掙扎於生活邊緣的小夥計、擦鞋童、教師、工人……都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勞苦大眾的故事。

這些小說多用嘲諷、挖苦的筆法寫成，除了對社會不平等提出控訴，我們還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作者「懷才不遇」的唏噓。作為書名的《馬票與美鈔》，寫肥佬朱訛稱中了馬票頭獎，事實是與人兌換假美鈔行騙，故事性強且情節吸引，但文藝性卻比不上小夥計偷米救濟窮人的《米》，和小學生大愛書而偷書，最後開了書店的《書》來得有意思。

「香港求實出版社」即是實用書局，那年代出過不少南來作家、南洋過客作家，及本地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從來未見有人提過「力克」。從本書的後記中知道，他一九五一年在醫院裡養病幾個月，構思了一些小說，在出院後的一九五二年間，一口氣把它們寫出來出版。如此說來，《馬票與美鈔》應是他的第一本書，但從選材及寫作手法看，力克絕對不是新手。寫這篇短文，我是「拋磚引玉」，望有知者告訴我：「力克」是誰？



力克著《馬票與美鈔》



陶行知與素質教育

「每天做內體運動一次；每天整潔一次；每天寫日記一篇；每天吃開水五大碗和豆漿一大碗；每天大便一次，且有定時；每天看本埠和外埠報各一份……」別誤會，這不是父母對孩子生活習慣的要求，也不是個人修身養性的辦法，而是陶行知的學生汪達之根據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為一九三四年淮安新安小學六年級學生制定的教育大綱。

曾幾何時，「素質教育」成了當代中國教育界最時髦的詞彙。只是這種教育內容究竟為何，具體操作怎樣，至今還是眾說紛紛。在內地各級學校實施幾年來，效果可好，收穫如何，那就更是天曉得了。其實，談到素質教育，外國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或許「不符合中國國情」，可是本土的教育先驅、鄉村教育家陶行知卻一定要提。他提出過「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要求教育與實際結合，為人民大眾服務，開展的實際上就是實用有效的素質教育。

陶行知（一八九一至一九四六）祖籍浙江紹興，但出生於安徽歙縣，他也一向以勤苦耐勞的「徵駱駝」精神自勉。他家境貧寒，因為母親在校幫傭，才有機會入歙縣的崇一學堂讀書。一九一〇年他靠教會資助入南京金陵大學文科。一九一四年留學美國，獲伊利諾大學政治碩士學位，後又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師從杜威。一九一七年秋回國，他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

一九二三年起，他卸脫下西裝換草鞋，放棄海歸教授的優裕生活，開始去鄉村辦教育。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至少有三億文盲，至少有七千萬兒童沒有受過任何教育，而通過教育才能改造中國。他與晏陽初等人發起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在南京北郊曉莊（原名小莊）創辦鄉村師範學校「曉莊學校」，又創辦了一個鄉村幼稚園「燕子磯幼稚園」。

上世紀三十年代他曾因國民黨通緝流亡日本，但仍不忘提倡科教救國。一九三二年，他回國創建了山海工學團，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進行軍事訓練、生產訓練、民權訓練、生育訓練等。他還發動了「小先生運動」，就是鼓勵學生回家為家人傳授知識，在家庭中掃盲。抗戰時期，他在重慶創辦主要招收難童的育才學校，為抗戰後的建設培養人才。

陶行知大概是現代中國最為平民化的知識分子，為老百姓俯首甘為孺子牛。他的名言有：「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捧着一颗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他最早注意到鄉村教育問題，一生辦過許多各種類型的學校，這些學校為社會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不過，他的另一個傑出貢獻，我認為是對於素質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探索。

關於學生的素質，陶行知認為健全的人格必須包括：「一、私德為立身之本，公德為服務社會國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識技能。三、強健活潑之體格。四、優美和樂之感情」。因此，具體辦學時，他就實行本文開頭提到的若干規矩，包括要求小學生「每年洗澡十到一百次」、「每年和國內外小朋友通信十二封」、需要認識環境中最常見的動植物各十二種和每晚能看到的恆星和行星十二顆、能欣賞名歌名畫和自然風景這樣貌似雞毛蒜皮的條目。

其實，陶行知一方面從小節入手，從生活習慣着力，打造具備「農夫身手、科學頭腦、改造社會精神」的實際人才、開拓人才。另一方面，他確實做到了教育面向鄉村貧民，而不是只培養象牙塔裡的精英人才，為真正需要素質教育的人群服務，為能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目標奮鬥。相比之下，如今那些生搬硬套、應試教育式的音樂、美術和體育課，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無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筆法，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我「公派」去美國的次年，女兒也去了，給人家看孩子，打工求學。六年後，她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安也去了美國。在班級裡當第一，語言當然不行。一年以後，和同學打成一片，但算術的優勢逐漸失去。當時，我和女兒都沒有工作許可，靠做家庭工，掙扎謀生，對兩個女兒悉心教養。我們實在也沒有這個條件。我和女兒所住的城鎮，相隔飛機航程七個小時，對安頂多也只是在電話裡問問一句，談不到盡外公的任何責任。

安讀初三的時候，鄰座一個曾經報學的女孩子，課餘到披薩店打工，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車，上學只是掛個號，生活愜意得很，令安很羨慕。近朱者赤，安逐漸脫離了中國人「讀書謀求前途」的傳統，融入了美國中下層群體的潮流。高中畢業後，文化課獨立及格可以進入大學，同時美國孩子那種急功近利、希望獨立生活的願望也變得非常強烈。父母和安妥協：如果她能每個學期完成所要求的「全職學分」課程（即大約每週十五個課外自學學分），父母將全部支付學費和生計費，其餘自己打工維持。兩年下來，完成的學分不足兩個學期的。既然不願意讀書，就全力打工、學會養活自己吧。此後，安在一家專賣青少年休閒服的連鎖店工作，過普通美國青少年的生活。賺多少、花多少；有了剩餘，就各處去玩了。

如此過了五、六年，在我和女兒通電話的時候，很少提到安，生活似乎就是這樣平淡地過着。忽然，有一次，女兒在電話中提到，安在服裝連鎖店工作不錯，漸漸從店長升任部門經理了。在安工作的這個分店裡，有六百員工，由六位部門經理分管；這次金融海嘯，店裡辭退了三位經理，她居然是被留下的三人之一。由此可見，安不能說書成材，但能居處職。以此說，她融入了美國社會，但能居處然把她列為「培養」對象，蓄意讓她有多方面的工作經驗。有一次，在安手下任售貨員的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用汽車送我女兒上地鐵的路上埋怨說，做這種店員，受教育程度差的人管，不是滋味，下學期去斯坦福讀碩士去了。其後不久，總店要提拔幹部，候選者中，只安一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落選了，也不冤。

昨天和女兒通電話，她說總店要把安調到另外一個州去，屬於陸運性質吧。女兒打斷了我的道賀，說安打算辭職不干，「要去上大學了」。但這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當年雖然已經讀過一些學分，但時隔七年以上，都算不數了。而且現在美國的大學看眼於吸收外國學生，以收取三倍的學費。美國居民的學費漲到每年三萬，包括生活費每年要花費五萬美元。安居然還雄心壯志地想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然，十年的管理經驗，必定大有利於吸收理論知識。我女兒說，安有決心，「沒有錢就貸款」。安已經三十歲，她是成熟了，能夠對自己負責，不再是羨慕在披薩店打工的同學的少女了。我的女兒說，且聽其言觀其行吧。

安得兒說，那是社會對她的教育。也許這是大多數美國青年人的成長模式。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無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筆法，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我「公派」去美國的次年，女兒也去了，給人家看孩子，打工求學。六年後，她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安也去了美國。在班級裡當第一，語言當然不行。一年以後，和同學打成一片，但算術的優勢逐漸失去。當時，我和女兒都沒有工作許可，靠做家庭工，掙扎謀生，對兩個女兒悉心教養。我們實在也沒有這個條件。我和女兒所住的城鎮，相隔飛機航程七個小時，對安頂多也只是在電話裡問問一句，談不到盡外公的任何責任。

安讀初三的時候，鄰座一個曾經報學的女孩子，課餘到披薩店打工，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車，上學只是掛個號，生活愜意得很，令安很羨慕。近朱者赤，安逐漸脫離了中國人「讀書謀求前途」的傳統，融入了美國中下層群體的潮流。高中畢業後，文化課獨立及格可以進入大學，同時美國孩子那種急功近利、希望獨立生活的願望也變得非常強烈。父母和安妥協：如果她能每個學期完成所要求的「全職學分」課程（即大約每週十五個課外自學學分），父母將全部支付學費和生計費，其餘自己打工維持。兩年下來，完成的學分不足兩個學期的。既然不願意讀書，就全力打工、學會養活自己吧。此後，安在一家專賣青少年休閒服的連鎖店工作，過普通美國青少年的生活。賺多少、花多少；有了剩餘，就各處去玩了。

如此過了五、六年，在我和女兒通電話的時候，很少提到安，生活似乎就是這樣平淡地過着。忽然，有一次，女兒在電話中提到，安在服裝連鎖店工作不錯，漸漸從店長升任部門經理了。在安工作的這個分店裡，有六百員工，由六位部門經理分管；這次金融海嘯，店裡辭退了三位經理，她居然是被留下的三人之一。由此可見，安不能說書成材，但能居處職。以此說，她融入了美國社會，但能居處然把她列為「培養」對象，蓄意讓她有多方面的工作經驗。有一次，在安手下任售貨員的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用汽車送我女兒上地鐵的路上埋怨說，做這種店員，受教育程度差的人管，不是滋味，下學期去斯坦福讀碩士去了。其後不久，總店要提拔幹部，候選者中，只安一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落選了，也不冤。

昨天和女兒通電話，她說總店要把安調到另外一個州去，屬於陸運性質吧。女兒打斷了我的道賀，說安打算辭職不干，「要去上大學了」。但這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當年雖然已經讀過一些學分，但時隔七年以上，都算不數了。而且現在美國的大學看眼於吸收外國學生，以收取三倍的學費。美國居民的學費漲到每年三萬，包括生活費每年要花費五萬美元。安居然還雄心壯志地想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然，十年的管理經驗，必定大有利於吸收理論知識。我女兒說，安有決心，「沒有錢就貸款」。安已經三十歲，她是成熟了，能夠對自己負責，不再是羨慕在披薩店打工的同學的少女了。我的女兒說，且聽其言觀其行吧。

安得兒說，那是社會對她的教育。也許這是大多數美國青年人的成長模式。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無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筆法，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我「公派」去美國的次年，女兒也去了，給人家看孩子，打工求學。六年後，她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安也去了美國。在班級裡當第一，語言當然不行。一年以後，和同學打成一片，但算術的優勢逐漸失去。當時，我和女兒都沒有工作許可，靠做家庭工，掙扎謀生，對兩個女兒悉心教養。我們實在也沒有這個條件。我和女兒所住的城鎮，相隔飛機航程七個小時，對安頂多也只是在電話裡問問一句，談不到盡外公的任何責任。

安讀初三的時候，鄰座一個曾經報學的女孩子，課餘到披薩店打工，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車，上學只是掛個號，生活愜意得很，令安很羨慕。近朱者赤，安逐漸脫離了中國人「讀書謀求前途」的傳統，融入了美國中下層群體的潮流。高中畢業後，文化課獨立及格可以進入大學，同時美國孩子那種急功近利、希望獨立生活的願望也變得非常強烈。父母和安妥協：如果她能每個學期完成所要求的「全職學分」課程（即大約每週十五個課外自學學分），父母將全部支付學費和生計費，其餘自己打工維持。兩年下來，完成的學分不足兩個學期的。既然不願意讀書，就全力打工、學會養活自己吧。此後，安在一家專賣青少年休閒服的連鎖店工作，過普通美國青少年的生活。賺多少、花多少；有了剩餘，就各處去玩了。

如此過了五、六年，在我和女兒通電話的時候，很少提到安，生活似乎就是這樣平淡地過着。忽然，有一次，女兒在電話中提到，安在服裝連鎖店工作不錯，漸漸從店長升任部門經理了。在安工作的這個分店裡，有六百員工，由六位部門經理分管；這次金融海嘯，店裡辭退了三位經理，她居然是被留下的三人之一。由此可見，安不能說書成材，但能居處職。以此說，她融入了美國社會，但能居處然把她列為「培養」對象，蓄意讓她有多方面的工作經驗。有一次，在安手下任售貨員的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用汽車送我女兒上地鐵的路上埋怨說，做這種店員，受教育程度差的人管，不是滋味，下學期去斯坦福讀碩士去了。其後不久，總店要提拔幹部，候選者中，只安一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落選了，也不冤。

昨天和女兒通電話，她說總店要把安調到另外一個州去，屬於陸運性質吧。女兒打斷了我的道賀，說安打算辭職不干，「要去上大學了」。但這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當年雖然已經讀過一些學分，但時隔七年以上，都算不數了。而且現在美國的大學看眼於吸收外國學生，以收取三倍的學費。美國居民的學費漲到每年三萬，包括生活費每年要花費五萬美元。安居然還雄心壯志地想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然，十年的管理經驗，必定大有利於吸收理論知識。我女兒說，安有決心，「沒有錢就貸款」。安已經三十歲，她是成熟了，能夠對自己負責，不再是羨慕在披薩店打工的同學的少女了。我的女兒說，且聽其言觀其行吧。

安得兒說，那是社會對她的教育。也許這是大多數美國青年人的成長模式。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無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筆法，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傳媒春秋

慕秋

我進入香港傳媒界工作，可說是半路出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曼谷生活了頗長一段時間。作為自由撰稿人，為《新中原報》和《中華日報》寫稿，詩、散文、小說等形式不拘。泰國當時共有七份華文報，讀者多為華僑家庭。華文報的新聞版內容一般，但文藝性質的副刊版則豐富多采，很受歡迎。

返國三年後移居香港，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進入一家出版社任編輯。出版社老闆直言出不起高人工，但會提供寬鬆愉快的工作環境。他笑說中國人才太多，如果出來一百萬精英，香港人會餓死不少。他的公司不大，員工不足二十人。編輯部、美術部骨幹皆是新移民。老闆說這裡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果不其然，同事間相處融洽，互補不足，出書效率很高。

我在這家公司學到許多編輯的基本功。香港八十年代還沒有電腦排版，需靠字字出味紙，再出陰陽片（菲林）後上機印刷。責任編輯接手一本書，除了封面由美術部設計，從寫前言到圖片的分色處理，與作者的資料溝通，及製作書籍的每一個細節，都需編輯獨立承擔，這為我後來進入報界工作打下良好基礎。

後來，老闆有了移民他國的想法，加之「九七」臨近，他經常與我們討論他兩個兒子的前途問題。在他決定到美國波士頓開一間書店之前，我離開了這家出版社。隨後在美國僑報（香港版）工作了三年，也是一段非常難忘的美好時光。

我於一九九三年進入《天天日報》任編輯。當時報館的辦公地址在北角的玉郎中心，後遷往觀塘的鴻圖道。新址供有幾尊關雲長的塑像，樓梯間煙霧繚繞。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無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筆法，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我「公派」去美國的次年，女兒也去了，給人家看孩子，打工求學。六年後，她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安也去了美國。在班級裡當第一，語言當然不行。一年以後，和同學打成一片，但算術的優勢逐漸失去。當時，我和女兒都沒有工作許可，靠做家庭工，掙扎謀生，對兩個女兒悉心教養。我們實在也沒有這個條件。我和女兒所住的城鎮，相隔飛機航程七個小時，對安頂多也只是在電話裡問問一句，談不到盡外公的任何責任。

安讀初三的時候，鄰座一個曾經報學的女孩子，課餘到披薩店打工，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車，上學只是掛個號，生活愜意得很，令安很羨慕。近朱者赤，安逐漸脫離了中國人「讀書謀求前途」的傳統，融入了美國中下層群體的潮流。高中畢業後，文化課獨立及格可以進入大學，同時美國孩子那種急功近利、希望獨立生活的願望也變得非常強烈。父母和安妥協：如果她能每個學期完成所要求的「全職學分」課程（即大約每週十五個課外自學學分），父母將全部支付學費和生計費，其餘自己打工維持。兩年下來，完成的學分不足兩個學期的。既然不願意讀書，就全力打工、學會養活自己吧。此後，安在一家專賣青少年休閒服的連鎖店工作，過普通美國青少年的生活。賺多少、花多少；有了剩餘，就各處去玩了。

如此過了五、六年，在我和女兒通電話的時候，很少提到安，生活似乎就是這樣平淡地過着。忽然，有一次，女兒在電話中提到，安在服裝連鎖店工作不錯，漸漸從店長升任部門經理了。在安工作的這個分店裡，有六百員工，由六位部門經理分管；這次金融海嘯，店裡辭退了三位經理，她居然是被留下的三人之一。由此可見，安不能說書成材，但能居處職。以此說，她融入了美國社會，但能居處然把她列為「培養」對象，蓄意讓她有多方面的工作經驗。有一次，在安手下任售貨員的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用汽車送我女兒上地鐵的路上埋怨說，做這種店員，受教育程度差的人管，不是滋味，下學期去斯坦福讀碩士去了。其後不久，總店要提拔幹部，候選者中，只安一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落選了，也不冤。

昨天和女兒通電話，她說總店要把安調到另外一個州去，屬於陸運性質吧。女兒打斷了我的道賀，說安打算辭職不干，「要去上大學了」。但這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當年雖然已經讀過一些學分，但時隔七年以上，都算不數了。而且現在美國的大學看眼於吸收外國學生，以收取三倍的學費。美國居民的學費漲到每年三萬，包括生活費每年要花費五萬美元。安居然還雄心壯志地想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然，十年的管理經驗，必定大有利於吸收理論知識。我女兒說，安有決心，「沒有錢就貸款」。安已經三十歲，她是成熟了，能夠對自己負責，不再是羨慕在披薩店打工的同學的少女了。我的女兒說，且聽其言觀其行吧。

安得兒說，那是社會對她的教育。也許這是大多數美國青年人的成長模式。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無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筆法，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我「公派」去美國的次年，女兒也去了，給人家看孩子，打工求學。六年後，她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安也去了美國。在班級裡當第一，語言當然不行。一年以後，和同學打成一片，但算術的優勢逐漸失去。當時，我和女兒都沒有工作許可，靠做家庭工，掙扎謀生，對兩個女兒悉心教養。我們實在也沒有這個條件。我和女兒所住的城鎮，相隔飛機航程七個小時，對安頂多也只是在電話裡問問一句，談不到盡外公的任何責任。

安讀初三的時候，鄰座一個曾經報學的女孩子，課餘到披薩店打工，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車，上學只是掛個號，生活愜意得很，令安很羨慕。近朱者赤，安逐漸脫離了中國人「讀書謀求前途」的傳統，融入了美國中下層群體的潮流。高中畢業後，文化課獨立及格可以進入大學，同時美國孩子那種急功近利、希望獨立生活的願望也變得非常強烈。父母和安妥協：如果她能每個學期完成所要求的「全職學分」課程（即大約每週十五個課外自學學分），父母將全部支付學費和生計費，其餘自己打工維持。兩年下來，完成的學分不足兩個學期的。既然不願意讀書，就全力打工、學會養活自己吧。此後，安在一家專賣青少年休閒服的連鎖店工作，過普通美國青少年的生活。賺多少、花多少；有了剩餘，就各處去玩了。

如此過了五、六年，在我和女兒通電話的時候，很少提到安，生活似乎就是這樣平淡地過着。忽然，有一次，女兒在電話中提到，安在服裝連鎖店工作不錯，漸漸從店長升任部門經理了。在安工作的這個分店裡，有六百員工，由六位部門經理分管；這次金融海嘯，店裡辭退了三位經理，她居然是被留下的三人之一。由此可見，安不能說書成材，但能居處職。以此說，她融入了美國社會，但能居處然把她列為「培養」對象，蓄意讓她有多方面的工作經驗。有一次，在安手下任售貨員的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用汽車送我女兒上地鐵的路上埋怨說，做這種店員，受教育程度差的人管，不是滋味，下學期去斯坦福讀碩士去了。其後不久，總店要提拔幹部，候選者中，只安一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落選了，也不冤。

昨天和女兒通電話，她說總店要把安調到另外一個州去，屬於陸運性質吧。女兒打斷了我的道賀，說安打算辭職不干，「要去上大學了」。但這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當年雖然已經讀過一些學分，但時隔七年以上，都算不數了。而且現在美國的大學看眼於吸收外國學生，以收取三倍的學費。美國居民的學費漲到每年三萬，包括生活費每年要花費五萬美元。安居然還雄心壯志地想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然，十年的管理經驗，必定大有利於吸收理論知識。我女兒說，安有決心，「沒有錢就貸款」。安已經三十歲，她是成熟了，能夠對自己負責，不再是羨慕在披薩店打工的同學的少女了。我的女兒說，且聽其言觀其行吧。

安得兒說，那是社會對她的教育。也許這是大多數美國青年人的成長模式。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無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筆法，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我「公派」去美國的次年，女兒也去了，給人家看孩子，打工求學。六年後，她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安也去了美國。在班級裡當第一，語言當然不行。一年以後，和同學打成一片，但算術的優勢逐漸失去。當時，我和女兒都沒有工作許可，靠做家庭工，掙扎謀生，對兩個女兒悉心教養。我們實在也沒有這個條件。我和女兒所住的城鎮，相隔飛機航程七個小時，對安頂多也只是在電話裡問問一句，談不到盡外公的任何責任。

安讀初三的時候，鄰座一個曾經報學的女孩子，課餘到披薩店打工，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車，上學只是掛個號，生活愜意得很，令安很羨慕。近朱者赤，安逐漸脫離了中國人「讀書謀求前途」的傳統，融入了美國中下層群體的潮流。高中畢業後，文化課獨立及格可以進入大學，同時美國孩子那種急功近利、希望獨立生活的願望也變得非常強烈。父母和安妥協：如果她能每個學期完成所要求的「全職學分」課程（即大約每週十五個課外自學學分），父母將全部支付學費和生計費，其餘自己打工維持。兩年下來，完成的學分不足兩個學期的。既然不願意讀書，就全力打工、學會養活自己吧。此後，安在一家專賣青少年休閒服的連鎖店工作，過普通美國青少年的生活。賺多少、花多少；有了剩餘，就各處去玩了。

如此過了五、六年，在我和女兒通電話的時候，很少提到安，生活似乎就是這樣平淡地過着。忽然，有一次，女兒在電話中提到，安在服裝連鎖店工作不錯，漸漸從店長升任部門經理了。在安工作的這個分店裡，有六百員工，由六位部門經理分管；這次金融海嘯，店裡辭退了三位經理，她居然是被留下的三人之一。由此可見，安不能說書成材，但能居處職。以此說，她融入了美國社會，但能居處然把她列為「培養」對象，蓄意讓她有多方面的工作經驗。有一次，在安手下任售貨員的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用汽車送我女兒上地鐵的路上埋怨說，做這種店員，受教育程度差的人管，不是滋味，下學期去斯坦福讀碩士去了。其後不久，總店要提拔幹部，候選者中，只安一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落選了，也不冤。

昨天和女兒通電話，她說總店要把安調到另外一個州去，屬於陸運性質吧。女兒打斷了我的道賀，說安打算辭職不干，「要去上大學了」。但這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當年雖然已經讀過一些學分，但時隔七年以上，都算不數了。而且現在美國的大學看眼於吸收外國學生，以收取三倍的學費。美國居民的學費漲到每年三萬，包括生活費每年要花費五萬美元。安居然還雄心壯志地想進哥倫比亞大學。當然，十年的管理經驗，必定大有利於吸收理論知識。我女兒說，安有決心，「沒有錢就貸款」。安已經三十歲，她是成熟了，能夠對自己負責，不再是羨慕在披薩店打工的同學的少女了。我的女兒說，且聽其言觀其行吧。

安得兒說，那是社會對她的教育。也許這是大多數美國青年人的成長模式。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無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筆法，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婚姻不是女人全部

楊不離

讀內地陸琪的新書《婚姻是女人一輩子的事》，其實裡面的內容針對一些恨嫁女而言，是有指導作用的。但其書名確實令人不敢苟同。有些事可以誇張，有些事不能誇張。譬如婚姻的功能與期限，用「一輩子」套牢女人，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首先，無論男女，一生之中至少有半輩子是婚前時代。沒有誰生下來就結婚，除非童養媳。從時間長度的定義上來講，顯然「一輩子」根本是未經大腦過濾的妄言。

其次，婚姻之於女人的重要性被過分誇大，忽視了生而為人的意義。彷彿女人的一生離開婚姻或者婚姻失敗的話，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女人半輩子都耗在婚姻這件小事上，才是正常完整幸福的生活？婚姻作為滿足人類生理、繁衍的本能需求，被制度化後成為男女關係官方認可的證明。它只是諸多生活形式之中可供選擇的其中一種。人生而不同。性格、際遇、環境、教育，太多因素影響，使個體生命的生活態度千差萬別。因緣際會起伏不定，各有各自的選擇與命運，而非千篇一律的複製品。怎能用一個婚姻，不分青紅皂白地定義所有女人的「一輩子」？

女人一輩子的事，恐怕沒有比前半輩子不受婚姻騷擾的時間在做什麼、學什麼更重要的了。猶如一顆小苗的成長，根與主幹的形成期，決定了以後人生的高度、花朵的密度、果實的成色。唐代著名女詩人薛濤，少女時代就開始以詩養家，與當時許多有名的詩人唱和往來。四十歲時和元稹有過短暫戀情。她的才華、美貌、詩歌、獨創的薛濤箋，流傳不朽。而終身未婚這個事，不曾減損她半分光芒，甚而憑添了幾分傳奇色彩。清朝才女李清照結婚過兩次婚。第二次婚姻被騙色騙財，狼狽告終。最終還是一個人孤獨終老。沒有李清照，誰又知道趙明誠（第一